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丛书

主编：张卓元 吴敬琏 厉以宁

加快完善 现代市场体系

JIAKUAIWANSHAN
XIANDAI SHICHANG TIXI

房汉廷 张 磊◇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丛书

主编：张卓元 吴敬琏 厉以宁

加快完善 现代市场体系

房汉廷 张 磊◇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房汉延, 张磊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5. 10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454 - 4275 - 5

I. ①加… II. ①房…②张… III. 中国经济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研究 IV. ①F1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6897 号

出 版 人: 姚丹林

责任编辑: 赵世平

责任技编: 许伟斌

封面设计: 彩奇风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 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中山市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中山市坦洲镇彩虹路 3 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
字数	216 000 字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
印数	1 ~ 2 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5454 - 4275 - 5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8306055 37601950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7601950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从农村改革起步到以经济体制改革 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

(代序言)

张卓元

中国从 1978 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从农村改革起步,到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后发展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三十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经济起飞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不断提供强大动力。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三十多年渐进式改革 逻辑发展必然结果

渐进式改革的显著特点是先着重推进经济改革,以振兴经济,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并逐步迈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采取渐进式改革,不搞快速转轨、一步到位,可以减轻社会震荡,在保持社会稳定前提下调整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一些环节,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稳步前进。改革为什么从农村起步?就是因为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物资供应特别是农产品供应紧张,主要农产品凭票供应,上亿农民吃饱穿暖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农民要求改变“一大二公”传统体制的要求特别迫切。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接着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后,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增长。1978—1985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 7.1%,大大高于一般年均 2%~3% 的增速。

市场取向改革的初步成果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改革的信心和期望,增强了商品意识和等价交换的意识。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还提出,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从此,中国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需要指出的

是，中国在体制内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在体制外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生力军。这是公认的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案例。

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的日趋繁荣，使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人心。1992年，在邓小平关于“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指引下，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此中国开创了在一个大国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伟大征程。中国经济迅速起飞，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加快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大大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外贸大国，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促进我国各项经济活动必须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则行事。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除经济体制改革外，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也日显重要和迫切。2012年，党的十八大顺势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五位一体的改革任务。这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首先，改革的目标更高更全面。过去主要提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改革主要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展开，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五位一体的改革，虽然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但现在毕竟是要全面推进五位一体的改革。再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逻辑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单兵突进的，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配合和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逐步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并取得明显成效。每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除了着重论述经济体制改革外，都会分别论述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党的十七

大报告第一次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独立为一个大部分，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设一部分，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二、发展要求改革，改革推动发展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一方面，改革是在经济社会碰到严重困难或者受到严重瓶颈制约时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抉择，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文革”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摆脱困境的关键抉择。又如前三四年，由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加上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为了更好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走向现代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以便继续释放改革红利，找到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改革由于能够扫除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弊端，从而能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增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78—201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2、2013、2014年，GDP的增速也达7%以上。由于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2010年起，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达7000美元以上，稳定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崛起，从贫穷落后的弱国一跃成为在全世界各方面有重要影响的大国，让全世界人民都赞叹不已，被称为“中国的奇迹”。

三、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 顺利进入新常态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何谓新常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时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可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活动向着重追求质量和效益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几年的努力。在这过程中，必须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为经济转型提供不竭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进入新常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主

要取决于我们能否顺利推进已经进入深水区的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因此，从多方面多角度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中肯的可行的改革建议，对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进一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的攻坚战，不仅要统一思想，使大家充分认识到重新启动各方面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要有好的顶层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 60 条改革项目、336 个改革举措就是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而且要克服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干扰，形成既得利益群体是渐进式改革不可避免的结果。为了更好地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强有力的领导和推动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还要选择好着力点和突破口，我认为，目前，应着力推进政府改革或政府职能转变改革，因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首先要解决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深化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教育改革等等，也有待于政府改革的深化和到位。

中国现阶段仍然处于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时期，发展潜力巨大。我们坚信，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下，中国将越来越在创新驱动下不断提高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使今后十年八年保持 7% 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逐步成熟和定型，人民群众将更好地、更切实地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2015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现代市场体系的演进历程	(1)
一、计划与市场“双螺旋”结构的提出与形成	(1)
二、政府—市场—企业“三段论”中的市场体系	(6)
三、市场体系内涵的丰富与现代市场体系的提出	(8)
第二章 价格决定的市场性	(14)
一、价格决定市场化的提出	(14)
二、价格功能与价格决定机制	(15)
三、中国价格决定市场化的历史脉络	(21)
四、中国市场决定价格的新使命	(25)
第三章 市场规则的统一性与开放性	(27)
一、现代市场规则及其作用	(27)
二、商事制度改革与市场统一性规则建设	(29)
三、负面清单制度与市场开放性原则建设	(29)
第四章 市场组织的竞争性	(35)
一、竞争与效率	(35)
二、竞争机制的作用形态	(35)
三、存在异化现象的市场竞争	(38)
四、竞争类型与垄断竞争目标的择定	(39)
第五章 现代市场的风险性	(45)
一、经济系统类型与风险的相关性	(45)
二、风险：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46)
三、风险机制及其作用	(51)

第六章 市场主体选择的自由性	(53)
一、现代市场经济的自由	(53)
二、保护自由的重要意义	(58)
三、自由选择成就中国巨龙腾飞	(60)
第七章 市场主体的平等性	(63)
一、平等的解析	(63)
二、市场经济的平等	(65)
三、集权体制的“平等”	(68)
四、市场平等的新路径：用不平等去创造平等	(71)
第八章 市场主体结构	(75)
一、概念分析	(75)
二、市场第一原生主体——消费者	(79)
三、市场第二原生主体——企业	(81)
四、市场第一派生主体——中央政府	(81)
五、市场第二派生主体——地方政府	(82)
第九章 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行为	(84)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	(84)
二、从市场组织资源角度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障碍	(87)
三、市场组织创新的途径	(94)
第十章 消费者行为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96)
一、消费者行为	(96)
二、消费者行为的市场约束	(99)
三、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	(103)
第十一章 政府在市场中的多重角色	(105)
一、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	(105)
二、政府的作用	(107)
三、“小政府”与“大社会”	(111)
第十二章 商品市场	(114)
一、完善消费品市场	(114)

二、完善大宗商品市场·····	(119)
三、健全装备品市场·····	(121)
第十三章 劳动力市场·····	(125)
一、人口红利、干中学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125)
二、中国会遭遇人口诅咒吗·····	(127)
三、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目前面临的问题·····	(131)
四、结论和对策·····	(135)
第十四章 金融市场·····	(137)
一、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的形成与中国经济起飞·····	(137)
二、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冲突·····	(141)
三、结论·····	(146)
第十五章 房地产市场·····	(148)
一、改革试验期（1978—1998 年）·····	(148)
二、国民经济支柱期（1998—2002 年）·····	(151)
三、政府控制发展期（2003—2013 年）·····	(152)
四、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期（2013— ）·····	(153)
第十六章 新型资本要素市场的建立与完善·····	(156)
一、新社会资本的创造与开发·····	(156)
二、技术资本化及其政府责任·····	(157)
三、创新资本聚合·····	(160)
四、企业家资本的发现与培育·····	(162)
后 记·····	(165)

第一章 中国现代市场体系的演进历程

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

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现代市场体系从争论到建立，从限制到发展，从局部发展到全面建设，已经走过了整整35年。在这35年中，市场体系有过快速发展阶段，也有过备受诟病阶段，更有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大市场、大分工的阶段。尽管从市场实现问题的提出，到市场体系的建立，再到现代市场体系的确立，经历过如此地曲折和不平，但有一条主线却是清晰明朗的，即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这八次“三中全会”，都给予了市场、市场体系、现代市场体系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充分地位。因此，今天要真正剖解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来龙去脉，就必须站在历史的视角，从社会主义中国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国本之争展开分析。

一、计划与市场“双螺旋”结构的提出与形成

关于市场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1978年前，虽然一直存在着市场，但对市场作用的认识以及政策倾向，都是逐步限制乃至最终消除的。1978年后一直到1994年左右，市场的作用虽然时大时小，但总体上来说国家政策的倾向都是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并逐步使市场的作用从被动转变为主动。

1. 1949—1978年：计划强旋与市场弱旋的“偏双螺旋”结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实施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不过很快就在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如果说,在1949—1956年这期间,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市场作用,并借此恢复生产、促进流通,也只能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其目的是让民族资本家以及小工商业者,有一个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渡期。这个时期,是新中国的草创期,也是新中国经济制度的探索期。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这个阶段市场在整个经济生活以及资源配置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消费过程乃至流通、再分配过程中,都存在为价值生产以及价值实现转型等问题,所以市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种观点,折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主要体现为对民族工商业市场活动的允许,以及小工商业者的大量存在。当然,这个时期的市场,更多地集中在商品市场以及生活服务市场,而资本品市场以及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已经基本被计划或统制所取代。

1956—1965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初期实践阶段。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深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影响,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直接导致了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计划经济体制,计划调节、计划配置成为“强旋”,而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使市场调节、市场配置沦落为真正的“弱旋”。因此,这个时期,中国的市场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消费品市场和一个时断时续的农村集贸市场,其他资源以及生产要素统统由计划或行政调节和配置。

当然,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斯大林主义,以及经济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在当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论。1956年10月,薛暮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孙冶方则在1956年第6期《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顾准则在1957年第3期《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这三篇著名论文,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分析市场或准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令人扼腕的是,在当时的认识和环境局限下,这些真知灼见非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反而成了修正主义言论。

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到底起不起作用?是短暂的过渡,还是持续的调节机制?除了经济理论界上述不同认识之外,在国家经济体制的确定上,陈云和毛泽东的观点也颇具有代表性。1956年,陈云在中共中央八大上提出了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述。他指出:“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



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①

1958年11月，毛泽东针对当时的生产资料“一平二调”等“共产风”，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商品生产是一个经济法则问题。现在有些人，对于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的积极意义毫不顾及，避而不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极不严肃的态度。现在，有些人大谈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现在我国还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和巴西还落后。现在还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来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商品生产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有，奴隶社会也有嘛！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商品生产呢？商品生产看它和哪个经济相联系就为哪个经济服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因此它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这正是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区别之所在。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你不搞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你就要剥夺农民。农民有三权：生产资料权，产品所有权，劳动权。你只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就要剥夺农民这三权。现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团结几亿农民。只要存在两种公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②

1958—1959年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这种认识，尽管还局限在两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上，但已经非常切中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调节和资源配置中所具有的意义的真谛，即使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大抵也如是。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这种对市场的正确认识深化和完善起来，而是在渡过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后，快速推进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把农村经济也完全纳入到计划经济轨道。这样，既然不存在两种所有制的巨大鸿沟，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市场的作用也由重要变成次要的了。

1966—1976年，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中国全面否定和排斥市场、市场机制作用的时期。进入“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学界万马齐喑，市场因素成为与社会主义经济完全不相容的异己因素。理论上，完全否定市场在经济调节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甚至连补充作用都不允许。代表性理论是马天水等人在“四人帮”授意下编写的上海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该书提出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问题，即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既有生

^① 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陶鲁笳：《我记忆中的毛泽东同志》，《经济日报》，1993年12月21日理论版。

长共产主义的因素，也有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其中市场的作用反复出现就是资本主义因素的表现。按照这套理论，“文革”时期把市场的作用视为“洪水猛兽”，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严格控制市场的复活，在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严厉打击市场因素，一时之间，市场成了过街老鼠，不仅城市经济难觅市场踪影，即使在农村也几乎杜绝了市场发挥作用的任何条件。^① 对市场作用的禁锢，并没有换来计划经济的繁荣，而是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在1976年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1977—1978年，中国虽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对市场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放松。

2. 1979—1984年：计划主旋与市场副旋的“主辅双螺旋”结构

既然计划经济未能使国民经济获得快速、稳定发展的业绩，市场怎样都无法被其他调节机制简单取代，那么有关市场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再次重视起来。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尤其是经济发展成为第一要务。恰在此时，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这次全会公报指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② 就是这样短短的一段话，事实上承认了价值规律是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调节乃至资源配置的重要规律。

政治上的解禁，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也随之活跃起来。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市举行了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其主题就是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孙冶方、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再次充分肯定了价值规律、商品生产以及市场实现的重要性，并且开始触及社会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命题。当然，关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此期间依然争议颇大。比如，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参加起草工作的袁木同志等五人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针对近几年在经济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强调市场调节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主张提出批判。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作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

①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

② 参见《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1978年。



别。”1982年8月，胡乔木同志批转了这封信。自那以后，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在媒体上出现了不少批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文章，而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销声匿迹。

不过，理论上的争论甚至是某些批判话语权的压制，并没有消解市场作用的发挥。从现实经济看，市场以及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引入到经济活动之中，特别是在率先进行改革的农村，市场显示出了巨大的活力，并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原来一直短缺的粮食、经济作物，在技术水平基本没变的情况下，出现了翻番式的增长，“价值规律”这个“伟大的学校”真正开始发挥作用。从国家主流经济思想看，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管理原则，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市场主体开始形成，市场机制逐渐发生作用，市场开始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补充手段。^①

计划主旋与市场副旋，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至此，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开始进入“主辅双螺旋”结构时期。

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界定，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有了更为清晰的表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是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特别是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界定，更是空前的。这次会议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3. 1985—1991年：计划副旋与市场主旋的“新双螺旋”结构

有计划商品经济在国本之争中大大地向市场经济体制靠近了一步，但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未来是市场向计划靠拢，还是计划向市场靠拢？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是市场还是计划？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争论。如首届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丁伯根认为，一定是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靠拢，并最终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兰格等人则坚持认为计算机可以取代市场解开经济运行的巨大联立方程，计划与市场完全可以合而为一。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1982年9月。

国内经济理论界的争论，也基本分为两派。1987 年左右，一些经济学家明确提出了市场取向改革，简称市场化改革。另一批人则对市场取向改革表示怀疑或否定，主张从“市场取向”转为“计划取向”，调子最高的论调是，“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①。

这场争论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1984—1989 年“市场取向”的主张更为主流，而 1989—1991 年“计划取向”更为主流。广为人知的是，1992 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同年 9 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场争论得以平息。不广为人知的是，1991 年，时任国家主席、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部署召开的 11 次专家座谈会在这场争论已给出了明确意见。

二、政府—市场—企业“三段论”中的市场体系

1. “三段论”模式的提出

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出现和逐步形成，标志性文件是中共中央十三大报告及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十三大报告有两个重要判断影响深远：一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二是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判断。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十三大报告如是说：“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②

^① 1991 年《经济研究》第 6 期发表了何建章的《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他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批判削弱和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的企图。”

^②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 年 10 月 25 日。

上述判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实事求是论断之一，也是开启中国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里程碑式的杰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对发展阶段的清晰判断，就不可能有清晰的制度、政策设计，更谈不上使用全人类的智慧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可能性。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判断，十三大报告更为清晰而明确——“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①

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有三个要件匹配：一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商品货币化表现，即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以市场价格为核心调节机制的市场机制；二是社会普遍存在以利润为动机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只有这些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市场运行的主体之后，商品经济才具有了微观基础；三是有效的宏观间接调控模式，即政府通过市场调节和控制微观经济活动，而不是通过僵硬的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甚至扰乱市场。

为此，中共中央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了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2. “三段论”模式中的市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活跃期，当时政府根据“三段论”模式，为整个“七五”计划期间确定了三大经济体制改革任务：一是搞活企业，培育和激活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微观主体；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方面使微观主体活动市场化，另一方面使国家宏观调控可以实现间接化；三是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从直接为主向间接控制转化。

毫无疑问，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可操作顺序来看，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居于关键环节的，它既是微观搞活的条件，也是宏观管理协调间接化实现的条件。因此，在中共中央十三大报告中，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了特别表述，即“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还必须是竞争和开

^①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